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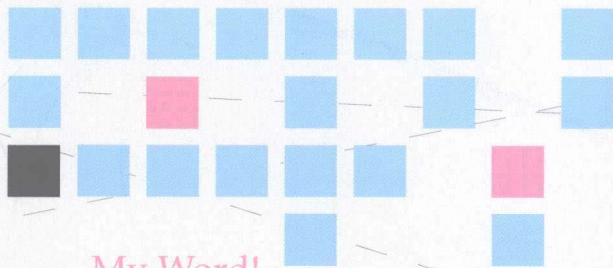
刘东 主编
大学之忧丛书

自己的话

——抄袭与大学文化

苏珊·D. 布鲁姆

卢文超 杨朗 译



My Word!

Plagiarism and College Culture

Susan D. Blum

高校内学术不端现象时有发生，如何杜绝学术造假行为，明确学术底线，建立经过学术认证，如何在学术共同体内构建公正的学术生产与学术评价体系，完善学术机制，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本书把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放到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探讨了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何以发生，如何杜绝等重要问题。作者认为，学术不端的现象主要来自大学在移植和不同文化之间有效沟通的缺乏。一方面，高校和管理人员对抄袭等严重的学术犯罪，处理不够，甚至是对个别主义和激进思想者的偏爱；另一方面，学生则沉浸在书本的狂热中，沉醉在拿学位的喜悦中，而忽视书籍一切代价经历的困难和艰辛。本书在两者间划学术之间划开了一道对话的窗户，这再也不会让大家回到彼此的对立与明辨。而这，正是学术的行为和学者间的持续之问话或契约的课题。

本书既为探讨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多种个案分析又提供了来自西方的案例，同时也为中西学术如何衔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值得学术共同体内深感兴趣的每一个人认真阅读。推荐。

自己的话

Ziji de Hua

——抄袭与大学文化

苏珊·D. 布鲁姆 (Susan D. Blum) 著

卢文超 杨朗 译

图字:01-2011-2838号

My Word! Plagiarism and College Culture, by Susan D. Blum,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9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己的话:抄袭与大学文化/(美)苏珊·D.布鲁姆
(Blum, S. D.)著;卢文超,杨朗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2.1

(大学之忧丛书/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My Word! Plagiarism and College
Culture

ISBN 978-7-04-033002-1

I. ①自… II. ①布… ②卢… ③杨… III. ①高等学
校-学术研究-道德规范-研究 IV. ①G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1695号

策划编辑 丁艳红

责任编辑 丁艳红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马敬茹

责任校对 张小镝

责任印制 张泽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机工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5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3002-00

献给 Lionel
再一次，直到永远！

再序《大学之忧》丛书

劈头就写下“再序”二字，是因为早已编过这套丛书，也早已为它写过了序文——而且还是一篇超长的序文。按我当时的设想，对于首批推出的那些教育论著，若不能逐一进行串讲，就无法呈现内容的衔接，也就很难收到预期效果。

在那篇序文中，针对那种无原则地吹嘘西方学府，尤其是自己的西方母校的做法，我曾发出了这样的议论：

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考察过别人究竟遭遇到了怎样的当代忧虑，以及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历史线索，才引发出了今天的这番忧虑，就基于其先入为主的西学崇拜，而张扬起别人已被瓦解的早年理想了——充其量到头来也再只能基于这种遥远的理想，捎带着也埋怨一下莫名其妙的西方竟也能今不如昔。这样隔靴搔痒的空疏议论，姑妄听之也就罢了，要是真想用来祛疾伐病，那还不耽误了大事！^①

不料，偏是上文中所谓忧虑的“忧”字，在当时的编者那里引起了真正的担忧，以致合作起来总是不顺——仿佛“大学之忧”这样一个标题，果然包含了多么不能见容的异议。然而，在这样的大是大非上，我却没有办法妥协。因为，意识深处的“忧患意识”，正是华夏民族不可稍离的警戒线，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慷慨自许，也表现出了最可宝贵的利他倾向。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是从阅读徐复观的著作开始的：

“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②

更何況，这套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译丛，还不过是引进和传达别人的忧

① 刘东：《众声喧哗的大学论说》，载《道术与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患！难道就连别家有病都不许谈论了么？连了解一下别人的疼痛都不能见容了么？

然则，就我本人的目力所及，似乎大洋对岸的教育学研究，大多都在表达着这种忧虑。尽管按照几乎被当作圣物的大学排行榜，他们简直拥有了所能梦想的一切优势，可人家还是在不断地自我批评，正如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所述：

高等教育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离不开它，也相信它的价值。当它带给我们失败，我们就变得失望；而当它开销太大，我们就变得愤怒。这种超乎寻常、至关重要的机构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逐渐成为今天这种状况的？^①

也正是借助于他们的忧思，我们才较为清晰地看到，尽管那边无论如何还算享有相对正常的学术秩序，尽管那边不管怎样也拥有举世最大的学者队伍，但那些几乎漂在钱海里的大学，却仍然不能被称作理想国。恰恰相反，人们仍有太多的理由去为它伤神和忧心：

- 忧虑它的过度市场化和企业化，它的文化精神流失；
- 忧虑它的批量生产和形式主义，它的暗中鼓励平庸；
- 忧虑它的集体腐败和拉帮结派，它的风格日渐趋同；
- 忧虑时而出现弄虚作假和剽窃，它被恶俗世风污染；
- 忧虑它像飘蓬一样无根地变异，它丢失了原有的传统；
- 忧虑它太贴向财大气粗的金主，它失去了独立地位；
- 忧虑它虚掷纳税人的辛勤血汗，它有违于公平原则……

果然也还是问题山积吧？不过，也要平心地说一句，无论出现了多少问题，又正因为他们还保持着这样的忧患，还可以自由地发表这种忧患，还可以再由此去呼吁革新，他们的大学才保持着相对的优势，成为当代美国屈指可数的国家优势之一。

而对中国读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些辛苦译的别家忧思中，还可以看出某些潜在的先机：一方面，那边如此雄厚的教育机制，尽管一时占尽天下的优势，却仍自潜在着诸多的缺憾，所以放眼历史的长时段，也未必就真不能被我们超越。当然另一方面，真想赶上和超过别人的话，就既不能憋在家里土法上马，用粗放的行政合并来滥造超级大学；也不能不假分辨地全盘照搬，甚至搬来了别人的教训和痛处！

^① 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阎凤桥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必须时刻牢记,这种文明间轰轰烈烈的潮起潮落,绝不是念几遍“河东、河西”的真言,就可以安稳地坐等的。它需要几代人的接续努力,更要求我们打从现在起,就在“读”与“思”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从而足以借助于丰富的联想力,去举一反三地检思自我们这边或许同样令人担忧、充其量只是暂未积重难返的问题。

还要记住,无论怎样好高骛远,总还要从脚下的这一步做起。毕竟,知识阶层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坚持不懈的、不屈不挠的、作为神圣使命的深刻反思。整个社会都指着我们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来清扫积弊呢,要是我们连自己安身立命的中国大学,都不能反思和打扫清楚,那么其他的一切就完全谈不上了!

主编 刘 东

2010年8月5日于静之湖沐暄堂

目录

- 导 论 大学里的抄袭 //1
- 第 1 章 判断的问题——抄袭并非是可以一劳永逸加以解决的问题 //12
- 第 2 章 互文性、作者身份和抄袭——我的话、你的话、他们的话→我们的话 //29
- 第 3 章 观察表演性自我——多样性与真实性 //61
- 第 4 章 在大学的泡沫中成长——青春期的任务与诱惑 //93
- 第 5 章 没有灵丹妙药——解构抄袭 //145
- 结 语 怎么办? //167
- 参考文献 //175
- 致谢 //206
- 索引 //209
- 译后记 //232

导论 大学里的抄袭

对一个农夫和一个教授陈述一个道德问题，
前者同样可以对其做出判定，并且经常比后者更为出色，
因为他还没有被人们制定的规则引入歧途。

——托马斯·杰弗逊：《给彼得·卡尔的信》，1787年8月10日

没有什么爱或者恨，
除非对其有所了解。

——列奥纳多·达·芬奇：《笔记》

“课堂作弊转向电脑”，“学生网上论文挑战老师”，“孩子们用起新工具”，“伪造成绩”。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标题都是有关美国大学校园里抄袭、作弊成风的惊人新闻：75%的学生承认自己作过弊，68%的学生承认曾经从网上剪切复制材料而不注明出处；而网站则以极低价格提供现成的论文，价格稍高一点的话，就可以提供定制的论文。^[1]

《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20-20电视杂志等大众传媒大肆渲染着这些话题，而《高等教育纪事报》、《高等教育杂志》、《高等教育内情》等专业的教育刊物则对之详加评述。全国的大学出版物都在声讨日趋严重的作弊、抄袭现象，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一现象之于校园意味着什么。^[2]每篇文章对此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或者理论，以解释作弊现象为何如此疯狂蔓延，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欺骗的文化，何以这一代人不再拥有上一代的诚实。荣誉准则这一制度虽已在全国实施，^[3]但即便像弗吉尼亚大学这样的学校——自1825年托马斯·杰弗逊创校之始就已有荣誉准则——也卷入了作弊丑闻之中。2001年在那里发生了一桩轰动性的违规事件，122名学生被发现在物理导论课上作弊。^[4]丑闻不断爆发，究其原因，在于世界范围内大学生对于原创性、对于信用存在不一样的理解，无论是在抄袭方面，还是在音乐下载方面。

大学于是纷纷求助于Turnitin.com一类的在线抄袭检测工具来检测可疑

的学生作业。伦理机构与宗教组织也表达了对作弊泛滥的担忧。^[5]学术界与新闻界都对作弊原因及其解决方式进行过探究,如揭示出教会中学里的作弊现象并不比非教会类学校少;兄弟会里的学生比其他的学生更有可能作弊;教师倘若追究学生明显违规行为的意愿强,其课堂上作弊行为的发生就会减少等。^[6]作弊的可能性正在持续上升,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作弊的因素(包括个人因素)有年龄、平均学分积(GPA)、自尊、性别、人格类型、疏离感等。^[7]其他研究在这六种因素之外还增加了四种:内外动机的抗衡、对社会规则的认知、对作弊的态度,以及对于制度方针的知识。^[8]

根据唐纳德·麦凯布(Donald McCabe)、琳达·克莱伯·特雷维诺(Linda klebe Treviño)以及肯尼斯·巴特菲尔德(Kenneth Butterfield)的数据,考试中严重作弊的比率从1963年的39%上升至1993年的64%,^[9]并在此后一直上升。写作中严重作弊的比率则保持着稳定,1963年是65%,1993年是66%。^[10]麦凯布、特雷维诺、巴特菲尔德等承认这一比率没有明显增长:

可能是由于“抄袭”的定义发生变化。总体来说,学生对于适当引用的理解似乎已经改变。在今天的很多学生看来,那些在鲍尔斯的研究(1964)之中可能被列入抄袭的某些行为,已经不再属于抄袭了。比如,尽管多数学生懂得逐字引用他人著作时需要标明引文出处,但当他们用自己的话来表述他人观点时,似乎就不那么清楚自己是否需要注明引用了。^[11]

2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问题:今天的大多数学生都不道德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作弊、抄袭吗?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是这样?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抄袭与作弊是一码事吗?学生是怎么理解抄袭的?

我花了三年时间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在我的学校进行人种志研究,并且就抄袭现象进行了广泛的阅读。抄袭问题在大学之中就有如巨型蛛网,这张网联系着其他种种因素,它们牵涉高等教育的性质(高等教育的性质反过来又与儿童与成人的性质相联系),教材与作者的性质,以及当学生完成并上交作业以获取学分时的性质与动机。互联网是这蛛网中的一部分,但是它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并不一样。道德,同样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但这并非因为多数学生不道德。

我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与假设一致。我开始时认为现在的大学生在大学生涯中,不会再像我当初,或者我所希望的那样在学术方面投入

相当多的精力,这一点已被我的访谈所证实。我也认为我应当会发现狂饮是近乎一半当代大学生的典型作风,同样,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至于我之前不曾预料,但又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年轻人对于目的、道德、行动等重大问题所具有的深思、明辨与热诚。

已经清楚的是,绝大多数大学生——此处我有点不安地对全国约1500万大学生进行概括,不过这种不安主要是对于那些提供住宿的传统重点大学之中的学生——他们强烈地试图寻求自己的生活道路,却受困于各式各样的烦恼:怎么来应对不诚实的友人,怎么应付过多的活动,怎么完成化学作业,怎么来告诉父母自己不打算去医学院,怎样节省书籍开销,怎么才能毕业后找到工作,怎样同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分手。

我还获得了其他一些看法:

社会的影响先于大学而塑造了学生的大学生活。大多数学生在家庭里得到呵护、赞扬与鼓励,在社区里是闪亮的明星。作为重点学校里的学生,他们自记事起,目标就在于进入大学。评价他们的是成绩与分数,这些在他们以及父母的眼中预示着他们能进入哪所大学。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非常地忙碌。

当他们很幸运地进入大学,繁杂的事物如影随形,被视为教育目的的考试依旧不容忽视。对他们而言,并不仅仅要用各种活动把日子填满,这些活动标志着他们进入了大学:课程、俱乐部、运动会、社交活动、工作。并且,他们还知道这是自己生命中一段短暂、珍贵、花费巨大的时光。因为很少有家庭可以对他们孩子的大学教育花费不屑一顾,无论是进校之前,还是来到大学之后,大学生们都知道父母为自己付出的心血。几乎有一半的全日制学生通过打工来支持自己的教育。所以,他们必须保证,家庭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他们必须获得成功。

他们匆匆忙忙——因为技能训练,因为他们的父母鼓励他们参加越来越多的活动以便能进入一所好的学校,因为我们的社会通常都关注付出与收益。他们会匆忙完成一篇论文——只要满足它在页数、参考书以及引用文献方面的要求就行了。学生们心事重重,并且把这些心事与养育他们的成年人进行交流。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的表现:论文是否优秀?分数是多少?

当今的学生都在文本的海洋中游泳(我在这里用“文本”这个专门术语,指包含语言乃至图像在内的各种写或说的东西,各种可以被“阅读”或者分析的东西)。他们整天发邮件,写博客,发短信。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是有史以来最富文字色彩、书写最多的一代。这些学生每时每刻都在写作,每时每刻

都在阅读。他们写的或者读的一些文章并未达到学术标准,但他们依然在不
停地写作和阅读,沉浸在一个充满文字的世界中。

网络和电子媒介深深地影响了学生大部分的生活——网络并不仅仅使
抄袭变得容易、诱人,而且还改变了他们看待文本的方式。

学生持续不断地和媒体打交道。他们用几个小时看电视,也可能是在
DVD 机上看电视连续剧,或者看电影。他们“引用”各种信息、相互交流。这
种引用——一种学术的形式,是多声部的、互文性的——展示了学生言辞的
复杂性、记忆力以及对于上下文语境及适用性的敏锐。这正是我们要求他们
处理学术文本时所应具备的技能。不同之处在于,当他们在学术背景下加以
引用时,他们必须慢下心来,在每篇微小的文本周围设立界限,探本溯源,记
下出处。这种缓慢与缜密与他们强调速度和效率的习惯是相反的。学生们
一向都会迅速完成一项任务,以保证可以进行下一项总悬在头顶的任务,不
论它是另一篇论文、一个小组设计的会议,还是一次宿舍的聚会。

学生沉浸在互文活动中,这和学术界要求的互文性有不同的性质和目
的。从根本上讲,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二者对界限、原创性和个体性的
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学术标准在不同学科,甚至不同文化之中也会不一样,
它重视原创性概念,而这种概念本质上是个体主义的。根据对“作者”这个
词的权威理解,作者意味着单独获得灵感,单独写作,并且可以单独将他们和
他们写的作品等同起来。因此,任何人使用某位作者写过的话必须要追溯到其
本人,因为他或她是这些话的唯一创造者。这种关于知识产权的观念(我将在
第 2 章详细阐述),是我所谓的“真实性自我”的特征。

除了繁忙的事务,还有另一个和当代大学校园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那
就是学生们都被教导要合群,所以他们喜欢一起工作,在集体中生活。我曾
一次又一次听到,一种最常被提及的赞美之语就是:某人“非常善于交际”。
当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学习、备考、吃饭、聚会时,他们很少会去追溯一个人对
另一个人的影响。毕竟,我们不是在他们儿童时就告诉过他们,首要的美德
之一就是分享么?这是罗伯特·富尔格姆(Robert Fulghum)在他 1988 年写的
经典之作《我真的需要知道我在幼儿园学到了什么》(*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中说过的。

这些学生已经吸收了他们老一辈在公社主义(communalism)方面的教训,
并接受了社会对生产率、成绩和速度的强调。他们想成功,不仅仅是经济成
功,同时也要对世界作出有益的贡献。

高等教育自身危机重重,不仅仅因为花费巨大,录取时淘汰比例高(对少

数的拥有很高声誉的大学而言),以及反歧视行动。高等教育成了一个没有重心,贪图实现很多目标的庞然大物:它想为学生的就业做准备;它想“拉平起跑线”,给美国社会的大部分成员提供经济机会;它在努力灌输“价值观”、“常识”和“人格”的同时,也在灌输所有公民都应该知道的信息(不用说,关于哪些特定的事实和价值应该包括在内存在巨大的争论);它提供技能;它为将来的就业机会提供关系网络;它激发年轻人,使他们用全新的、更为复杂的方式看待世界;它是一次宝贵的机会,或者仅仅是学生长期受教育生涯中期待迈出的下一步;它给大一些的青春少年提供成为年轻人的时间和空间;它是关于玩乐的,就像一年一度的夏令营;它是交易;它是责任,属于国家、纳税人、捐款者及校友、教堂或学生们自己。有些人担心,当富裕的青少年在接受广泛的人文教育的同时,他们那些并不富裕的同龄人却只能接受职业培训。

这种全国范围内教育上的混乱又和学生自己读大学的不同目的搅在一起。他们很努力,试图实现很多不同的目标,在每次早饭前都得相信远多于六件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典故——这被认为是常识,因此并没有必要标明引文。所以,我的引用并非抄袭,即便我确实直接从卡罗尔那里借用时,也不必标明我的资料来源。)

学生抄袭,即不恰当地将别人的文字用在自己的文章中,且不标明资料来源,也许就是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一些人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因为规则非常微妙,需要数年才能驾轻就熟。也有些人故意这样做,以便完成作业。总之,抄袭是由很多动机、原因和人生经历所造成的。

当然,“抄袭”这个术语本身含义非常广泛:直接提交别人写的论文,这是学术欺骗;在文章中省略从其他文本中引用的标志,这经常是关于技巧和细心的问题(见第1章)。

底线是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学生抄袭都完全定位为个人道德问题,而不去考虑他们身处的教育以及社会背景中的相关信息。如果有一多半的人会抄袭,那么很显然,这是一些文化影响驱使他们这么做的。

今天的学生正处在十字路口上,用新的方式来考虑文本及其作者和引用者。就像在所有跨文化对话中一样,第一步是承认有两种系统在起作用。显然,21世纪的学生和他们20世纪的长辈之间观念差异巨大,并且,这种差异还需要细察。只有我们弄清楚这点,才能去寻找转译者,也就是能够明辨差异的人。只有那时,我们才能超越年龄和地位的屏障,进行有意义的交谈,以便更好地理解彼此。

在教了20年书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学术训练已经将我变成了学者文化中的一员,这种文化对学生所处的文化而言,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就像克利福德·格尔茨说过的:“陌生并不开始于水的边缘,而是开始于皮肤的边缘。”^[12]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相信,如果想去理解另一种文化——即便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我们必须进入那种文化的地域,调查那些通常难以言表的信仰、制度、愿望和行为。这正是我要做的。这本书就是我的实地调查报告,一旦找到合适的视角,我就会对这些在身边发现的事进行阐释。

尽管我只能观察学生的行为,但我想了解的是他们关于抄袭的想法,以及那些想法和行为的背景。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获得了四位出色的本科生的帮助,他们是特雷莎·戴维、凯瑟琳·肯尼迪·约翰逊、鲁帕·乔斯和雅各布·韦勒。他们能在和同学聊天时,并不刻意地引向某个具体结论。从2005年2月到2007年3月,整整26个月的时间(6个学期),这四个学生对他们的同学进行了关于大学的访谈。这四个助研学生——三个女生一个男生,对这个项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很乐意跟着我不断改变的兴趣,并一直在研究过程中提供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和分析。

有时,当我听到他们的交谈,或者读到他们的部分手稿时,我对这四个年轻人感到惊叹不已,我非常喜欢他们。他们能在仔细倾听同学谈论时不忘自己的目的,他们能使谈论者放松,并且自己能保持价值中立,因此受到大家的欢迎。他们激发同学对一些设置松散的焦点问题进行广泛回应。毫无疑问,这个项目的所有一切都应归功于他们。

7 我们的问题涉及以下主题:学生对大学的一般看法及上大学的目标(为了追求知识、通向商业成功的必经之路等);他们在工作 and 娱乐中的行为;他们的日常活动;他们对怎样写论文的理解;他们对学术准则的态度;他们日常对话中对歌曲、电视剧和电影的引用以及这种引用的价值和意义(互文性);下载和分享音乐;他们对学生作弊和抄袭及其影响因素的认识;他们关于诚实、个性和集体性的认识;他们关于成功的想法;他们对自己外在表现的看法以及自我概念。

虽然大约一半的访谈的确问过被访者是否知道别人有过作弊或抄袭,但我们并没有直接问受访学生自己是否参与过。有时,正在接受访谈的人会自愿提起这个话题,或者是因为他自己曾抄袭或作弊过,或者是因为他知道别的同学这样做过。就像在所有的访谈中一样,我们并不能将学生完全理解成“说真话”,而毋宁是他们想在同龄的采访者面前表现出有德行的或勇敢的自我。^[13]

这四个学生开始时访问他们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但他们也关注陌生人。考虑到我教书的大学是随机分配室友的,学生们认识其他人的方式并不局限于只通过他们熟悉的那些人。

我也让采访者在其他同学中进行访谈,让他们记录下朋友之间普通的、非正式的对话。采访者可以选择在或不在访谈的现场。我并没有给他们安排议程表和暗含的主题。人类学家和其他研究过语言的学者都知道,很多重要的文化信息都是通过这样的交流传递出来的。

所有的参与者都采取保密或匿名方式。我们邀请他们选择自己的假名,很多人都这样做了。他们选择的假名五花八门:从英俊不凡的演员“约翰·斯塔默斯”到平淡无奇的“卡伦”,从描述性的“猴子朋友”到亵渎神明的“JH 基督”。假如学生不给自己选择假名,我就给他们选一个。因此,在文中没有一个学生使用的名字是真实的。

采访者也采用相似的匿名。当这份工作开始后,我们无法确定将发生什么,所以我向他们保证,他们的话也不会被人认出。

总共有 234 人参加了 154 次访谈(一些访谈包括一个学生以上)和 32 次对话。有关这些谈话的手稿就用了 5 000 多页不空行的纸。

在一个以统计学意义和样本代表性为目标的调查中,234 个受访者并不充分,但这里调查的目标有其特殊性。^[14]研究的目标并非去预测哪类特殊的学生——哪个性别、阶层、种族、专业或生源——更有可能去作弊或抄袭。它并不是去解释统计数据,而是通过采用文化语境或者文化潮流的概念去解释模式。我曾从大量文献中了解到与抄袭和作弊相关的各种语境,学生的话充实了我在这方面的背景知识。

尽管我并没有申明我所在的大学具有代表性,但我坚信,我的很多研究发现都适用于其他不少机构,尤其是其他私立名牌大学。在美国大约 1 400 所备案的四年制大学中,只有 146 所被认为是非常或极其著名的;大约 170 000 名学生在这些大学读书(在四年制以及二年制的大学中,这个数目都低于全体学生数的 10%)。^[15]我们应该关注学生总额的这一小部分,并非因为这些学校必然好于其他学校——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一所学校的好名声对其教育效果并无影响^[16]——而是因为我们如此多的文化精力都聚焦于思考它们。它们的学生被认为是精英,并且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们是最成功的青少年通过高等教育增加文化资本的地方。

为了避免读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所具体的大学,我采用了将这所大学称为“圣徒大学”(Saint U.)的文本策略。人类学有使用假名称呼现场

地点的悠久传统,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村庄的身份,另一方面则以此强调,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地点,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应该被评价或判断为本来就该被我们注意的目标。尽管圣徒大学的真实身份不可能一直不为人知,但我希望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它的特殊性上引开。迄今为止,总共有三个对大学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杰出样本:多萝西·霍兰(Dorothy Holland)和玛格丽特·艾森哈特(Margaret Eisenhart)的《在浪漫中受教育——女性、成就和大学文化》(*Educated in Romance: Women, Achievement, and College Culture*),他们在书中将研究的地点——大学,当然不是村庄——称为“布拉德福德”和“S大学”(SU);迈克尔·莫法特(Michael Moffatt)的《在新泽西成年——大学和美国文化》(*Coming of Age in New Jersey: College and American Culture*),在书中,作者将背景设为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凯茜·斯莫尔(Cathy Small)的《我的大一那年——通过变成学生,一个教授学到了什么》(*My Freshman Year: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作者以假名丽贝卡·内森(Rebekah Nathan)出版此书,并在书中将北亚利桑那大学公开,称其为“Any大学”,她还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每个人类学家都面临着不同的情况,这要求他们机智地揭示或隐藏自己的研究地点。在这里,我很乐意承认我的研究对象,但我坚持认为,这不该是读者注意的对象。

读者应该将此看作一个关于高等教育文化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的适当限度是揭示思想和行为的深层模式。它的优势就在于研究者对该领域非常精通、非常投入。以我来说,在圣徒大学教书已经8年,我既有内部人的视角(作为一个教授),也有外部人的视角(作为一个从学生获取信息的研究者)。在适当的时候,我也会利用其他学校的信息,它们表现出了共同的倾向性。

你或许会问,圣徒大学作为一所明显的教会大学,与其他学院和大学有多么不同。约瑟夫森伦理学会已经表明,被报道的有关公共高中和私立教会高中学生作弊行为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我认为这也适用于大学。^[17]教会大学和非教会大学或许对我所称的表演性自我(performance self)(见第3章)有不同的侧重。比如说,也许后者会更加强调团结一致。我希望探索的并非只是抄袭的统计学发生频率,而是一种解释性的文化模式。由于圣徒大学的学生完全浸染在美国的文化氛围中,在其中,可以明显看到与抄袭纠缠在一起的层层网络。我并不想去“重击”一所教会大学。我非常赞赏这些学生的雄辩和思辨,我相信,他们就像其他很多人一样说话和做事,这些特点对于这一代学生来说是共同的。

抄袭的概念——“不恰当地”使用别人的话——一直在变化。因为高等

教育、“文本”的意义,以及关于自我的观念等与其相关的因素也一直在变。尽管“抄袭”这个术语本身就像“作弊”一样,包含了从无伤大雅到犯下罪行的一系列行为,任何人,若想要理解诱使学生选择抄袭的力量,都需要对这三个变化中的语境有所理解。我们将首先揭示抄袭本身的概念,接下来看它如何与这些文化变迁的领域交织在一起。学生经常是社会转型的先锋,让我们看看这意味着什么。